

导言

文化碰撞与交融中的大马教育

—

马来西亚是一个在二战后迅速崛起的新兴工业国家，其经济发展速度在亚洲仅次于“四小龙”。马来西亚常常被简称为“大马”，这既指马来西亚是由包括马来联邦、马来属邦和海峡殖民地在内的若干块殖民地组成的国家，另一方面也表征着这个国家的多元种族特性——这是一个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三大种族和睦相处，宗教、语言和文化多姿多彩的具有包容性的国家。一个“大”字，既表达了马来西亚人民的自豪感，也或多或少寄托着马来西亚的大国之梦。马来西亚不仅是亚洲经济奇迹的缔造者之一，也是“亚洲价值”的主要倡导者，认为自己的成功是亚洲传统价值观与西方工业技能完美结合的结果，始终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马来西亚为自己取得的成就而自豪，同时也对未来充满

自信。矗立在吉隆坡首都广场的马来西亚石油公司大厦 88 层双塔楼 兼有伊斯兰教和儒教特色 楼高 452 米，打破了由美国西尔斯大厦保持的世界最高建筑的记录，一时间似乎成了文明东移的象征。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医生最喜欢说的一句话——“马来西亚能做到！”正是马来西亚奋发向上的国民精神的真实写照。

与其社会和经济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一样，马来西亚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为世人所瞩目。独立以来，马来西亚教育实施了许多有效的改革和发展计划，建立了与本国多元种族社会和经济建设相适应的国民教育制度，使本国公民享受良好的教育。20 世纪 90 年代，马来西亚提出“2020 年宏愿”力图在 30 年间建设成为全面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将马来西亚推向世界先进国行列。与之相应 马来西亚提出了“建立世界水平的教育体系”使马来西亚成为“区域优质教育中心”的目标，并启动了一些雄心勃勃的教育发展计划，其中为迎接信息时代挑战而精心定制的“智能学校”（Smart School）计划受到了国际间的关注。

近十几年来，我国对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学校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小龙”而对马来西亚这个后起之秀的了解非常有限。实际上，马来西亚基础教育体系是在 20 世纪中叶摆脱西方殖民统治以后，以促进民族国家的振兴和经济发展为目标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在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独特问题情境下，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碰撞过程中，马来西亚基础教育通过借鉴和创新，而不断探索自己的道路，形成自己的特色，其中蕴含了许多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的经验。

二

马来西亚曾经历过漫长的殖民统治时期，对民族伤痛记忆犹

新。独立以后，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民族化道路一致，改造殖民时代的教育体系，发展国民教育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的第一大主题。作为一个在殖民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种族、多文化、多语言的国家，民族团结与国家发展是教育发展的双重目标。对二者关系的处理，产生了既有冲突碰撞又有融合互补、在族群互动中向前发展的独特的教育实践。

马来西亚是在殖民者的炮火中步入现代社会的。西方现代文明在不断冲击和侵蚀本土文化的同时也成为本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立前英文教育的显要地位就是明证。而除了西方文化和土著文化，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自古就在本地区发挥重要影响，并随殖民地经济开发带来的大规模移民，发展成为带有各自社会组织形式的文化体系，其中华文教育和泰米尔文教育实际上是当时大众教育的主要形式。这种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局面对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是不利的，因此早在独立前夕，马来人的精英领袖们就着手建立一个以使用国语为特征的统一教育制度，以形成共同的国民意识，铸造一个和谐、团结和统一的马来西亚民族。马来精英统治阶层当初梦寐以求的景象是，有朝一日各族学生能够在同一课室里使用他们的国语即马来语上课。然而事与愿违，这一目标至今也没有实现。虽然英文学校已被改制，但国民教育体系中仍然是三种民族语言源流学校并存的局面。政府在统一教育制度和构建多民族和谐共处的共同文化方面，做了许多尝试和探索，然而这种政策与多元种族社会在种族情感、文化价值和母语教育上的多元化要求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马来西亚教育的特殊之处在于，这种价值冲撞并没有伤害到多种族源流教育共生的事实。民主政治框架下的族群互动，使政府与民间社会之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尽管始终存在着张力和争议，不过与一些背景类似的国家相比，则显然要成功很多。我们知道，种

族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敏感的社会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处理得不好，很容易使整个国家陷入民族主义的困境。而在马来西亚，我们并没有看到“因为母语教育而影响到爱国”的情形，新生代的华人、印度人与马来人一样，对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马来西亚有着深切的认同。马来西亚也许在有意无意之间诠释着一种全新的民族国家概念。至少在一国范围之内，马来西亚的个案可以成为反驳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有力依据。

种族、文化的多样性在为马来西亚基础教育发展带来很多困难的同时，也有其优越的一面——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和交融，有可能成为创新的源泉。我国学者余秋雨在评论几个东南亚地区的文化状况时曾谈到，马来西亚两种文化（华、巫）的冲撞、高速发展的经济以及比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大得多的地理环境，使它有可能产生精彩的文化。^①当然，创新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马来西亚能不能做到，我们还要拭目以待。而马来西亚国民教育在自身独特的问题情景中的改革实践，已经给我们思考国民教育政策提供了宝贵启示：克服民族主义的狭隘眼界，保持和促进文化多元性，将有利于调动各民族的积极性，发挥各种文化的优点，使国家发展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掘。

三

马来西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又是一个以建立现代工业为特征的外生型现代化的进程，必须通过借鉴西方生产方式、西方科学技术才能达到目的。教育作为最广泛、最有效的社会现代化手段，担负着培养适应现代生产需要、具有现代观念的人才的重任。对

^①《余秋雨看新马中港台文化转型》载《联合早报》，1998年。

于一个以伊斯兰文化为主体的传统社会来说，如何避免在移植外来现代文明的同时丧失自身的民族性，陷入“全盘西化”造成的国民性的迷惘和失落状况，是一个重要课题。

马来西亚的思路就是在借鉴和引进的同时，固守东方价值观念，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与许多伊斯兰国家不同，马来西亚选择的是世俗伊斯兰国家的道路，反对宗教极端主义，鼓励伊斯兰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这表明马来西亚没有把传统看作一个一成不变的教条，相反，马来西亚认识到传统文化必须通过自身的革新与进步，才有可能实现与现代化进程的融合；让传统走进现代，才是继承传统必要的前提条件。这种开明的态度，对促进教育的现代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教育对培养人力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受到重视。主要的教育改革和发展计划，大多是围绕国家发展计划而推出的。20世纪80年代的“一体化”课程改革、90年代以信息技术革命为背景的“智能学校”计划，21世纪初改变国语教学政策而推行以英文教数理科的措施，都表明马来西亚实际上把教育发展作为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在科技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特别是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马来西亚仍在不断积极探索走在时代前面的改革举措。

当然，马来西亚不会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价值和文化遗产。这些价值包括宗教价值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美德，如家庭和集体观念、注重服从和守纪律等，与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形成对比。这种价值教育常常使一些人与在东南亚国家盛行的威权政治体系混为一谈，指责其有悖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普遍价值原则。但是马来西亚把传统文化看成是现代化的源泉而非障碍，把传统价值看成是实现个体和谐发展和国家发展的共同基础。

从客观作用上看，传统文化因素、传统价值对维护社会稳定和加速国家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马来西

亚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取得巨大成就，因不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取得而被称为“亚洲奇迹”。在经济成就面前，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增强了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自信，“亚洲价值”似乎成了既可以利用现代文明又可以克服西方社会弊病的重要法宝。这种说法也许略嫌夸张，但是在坚持传统价值的同时采用的实用主义策略，通过学校教育尽快借鉴和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正是马来西亚能够发挥“后发性优势”不断赶超先进技术，提高国家现代化水平的一个关键。马来西亚过去几十年来的成就，为倡言“多元现代性”的新儒家学说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注脚。

四

与其他许多亚洲国家一样，马来西亚的教育政策也体现出典型的以社会发展为中心，注重国家功利的倾向。这种价值取向的教育建立在东方道德理想的基础上，正是所谓“亚洲价值”这个概念所要传达的特征之一，但是在今天看来，它所导致的教育文化是很值得反省的。对国家、民族的崇高使命感，以及社会、族群中心的取向，与现代社会对个性发展的要求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在马来西亚，这种国家、社会、族群乃至宗教中心的取向由于族群政治问题而更显突出。亚洲经济发展的成功的确助长了亚洲人对自己古老文化的自信，并在理论上以“新儒家学说”和“亚洲价值”强化这种信念。其中的是是非非当然还有待于深入探讨，不过从课堂教学层面观察，社会中心取向的教育忽视个性发展、不重视批判思维和创新思维的现象，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在科技迅速发展，知识轴心社会渐趋成型的时候，这一问题尤其需要迫切加以解决。

社会中心、国家中心的价值取向在课堂中演变为一种对我们

来说非常熟悉的教育文化，这种文化对知识、对考试、对教师的重视要远胜于对学生的重视。对此，马来西亚希望通过课程内容结构、教学方法和评价模式的改进来解决这个问题，并作了许多尝试。20年前的课程改革已开始尝试综合化课程，并将课外活动作为辅助课程纳入教学计划。当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向善于洞察先机的马来西亚改革者启示了另一条变革途径。他们希望借助多媒体和网络技术，开发以个体学习为中心的新型课程。通过引入自我入门、自定进度、自我定向和即时评价的电子学习概念，使教师成为名副其实的引导者，而学生真正成为自己学习的主人。技术和方法肯定有所帮助，但是它能否穿透社会文化历史积淀而成的厚土层，则仍需留待实践的检验。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社会结构中的基本问题得不到根本上的解决，整个教育思想就不会真正实现转型，也就不会有革命性的进展。如果教育只是威权政治培养驯民的工具，如果国民教育制度还不能做到不分种族地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那么个性化教育、全人教育恐怕只能是一句空话。

我们国家以及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显然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情境。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典型的个案，其教育改革的实践和经验无疑具有超出本国范围的意义。

本书第一章是对马来西亚基础教育发展背景的一个宏观介绍，既提供一个纵向历史线索的勾勒，也试图从中把握马来西亚教育发展的基本问题；第二章是对马来西亚教育体系基本情况的一个概述，为后面的专论提供基础；第三章至第六章就学校课程、师资发展、道德教育和一项正在实施中的政府发展计划作重点的考察和评论，以取得对马来西亚教育比较深入的了解。最后一章用较多的篇幅介绍了华文教育，这既是为了提供一个实例加深说明

多元种族社会中的教育问题，也是为了使读者对这个海外华人社会规模最大、最完整的教育体系有更多的了解。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个与我国文化教育有着共同文化血脉的教育体系知之甚少，希望这一章的介绍能够成为改变这一状况的开始。

第一章

大马教育的演进： 在铸造统一民族国家的道路上

马来西亚有悠久的历史，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却还很年轻。当代马来西亚教育的发展，与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成长历程不可分割。告别殖民地历史，通过经济发展和社会重组，建设一个多民族统一的现代国家，是马来西亚现代化进程因而也是贯穿马来西亚教育发展过程的一根主线。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和教育遗产，多种族、多文化的独特背景，使马来西亚的国家发展面临与一般民族国家迥异的问题情境，也造就了马来西亚基础教育与众不同的实践模式。在过去几十年来，马来西亚与其他相似国情的国家相比，能够享有长期的政治稳定，实现经人瞩目的经济腾飞，教育发展在这当中功不可没。

一、教育发展的背景：独特的社会生态

殖民者的炮火将马来亚从近于部落生存状态带入近代社会。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后，马来西亚又迅速进入争取独立的斗争，从殖民地崛起为一个现代主权民族国家。这一过程浓缩着巨大的历史时空转换。由于种族、文化的多样性以及殖民地社会、政治和经济遗产的特殊性，马来西亚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交织着马来人与非马来人、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权威与民主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形成了马来西亚独特的多元种族社会生态。在这种背景下，教育作为社会融合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工具，其改革演变过程必然遭遇种种特殊的课题。

1. 得天独厚的资源与环境：经济发展的良好基础

马来西亚地处亚洲大陆东南部，总面积 330 434 平方千米。全境被南中国海分割为东马和西马两部分。东马是加里曼丹岛的一部分，由沙巴和沙捞越组成；西马位于马来半岛南部，北与泰国相接。西边的马六甲海峡是欧、亚、澳、非四大洲海上航运的重要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据 2000 年统计，全国人口达到 2327 万。^①人口分布极不均匀，80% 以上的人口集中在面积不到全国一半的西马。

马来西亚地处热带，三面环海，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年平均气温在 29℃，无明显的四季变化，常年高温多雨，适宜农作物特别是热带亚热带作物的生长。马来西亚的森林覆盖率高达 74%，是一个绿色的国度，盛产各种热带硬木，如柚木、紫檀木、铁木等，均为名贵木材。主要经济作物包括橡胶、油棕、可可、椰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11.7。

子、胡椒、甘蔗等，其中橡胶、棕油的产量和出口量至今仍居于世界前列。此外，马来西亚还有漫长的海岸线，海洋物产十分丰富。

除了绿色的森林和蓝色的海岸，马来西亚还拥有丰富的地下矿产资源。一百多年来，马来西亚一直是世界最大的锡生产国和出口国，年产量超过 6 万吨。锡和橡胶一起，也是享有世界级声誉的产品，使马来西亚获得“锡胶王国”的称号。已探明石油储量达 30 多亿桶，天然气约 2 亿立方米。此外，铁、金、钨、煤、金、铅土等矿藏的储量也非常可观。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使马来西亚在 16 世纪以后成为西方殖民者眼中的一块肥肉。而战后马来西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与其优越的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不无关系。历史学家指出，太好的生存条件往往会成为社会进化的阻力。这也许可以用来解释马来西亚的过去，不过对于一个已经进入现代社会的国家，自然要另当别论。

2. 多源流整合的文化与历史：冲突与融合的过程

马来人的种族起源问题，也即“谁是第一个马来人”的问题，事关谁是本地人，谁是后来者，常常是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敏感话题。据一些学者研究，马来半岛自古就是一个杂居之地。土著马来人主要有 4 个人种。从人种学、语言根据及文化等角度分析，其来源地较广。“现代马来人基本上由这些原始的马来人发展而来，但他们的血统已经同近代的印度人、中国人和阿拉伯人的血统混合在一起了。”^①一般认为，在殖民者入侵以前，马来社会并不是一种紧密的共同体，政治上也不是统一的，因而不存在一个马来人的“民族特性”。这一点对民族国家的建立必然会产生微妙的影响。独立初期关于建立“马来人的马来西亚”还是建立“马

陈晓律等：《马来西亚》第 9 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年。

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政治争论，就是一例。后者是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的政治主张，要求民族国家的建立必须超越任何个别的种族、个别社团的利益，以马来西亚各个种族、各个宗教之间的政治联合为基础。

早在公元前 7 世纪，华夏文明已在这里产生影响。1405 年到 1433 年间，郑和率领的明朝船队先后七次经过马六甲海峡，为这里带来先进文化和友谊。但是华夏文化的影响后来却不及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在历史演变过程中，马来人逐渐形成和接受了以信奉伊斯兰教为特征的宗教文化。到 15 世纪，也正是在郑和船队活动期间，伊斯兰教兴起并被确定为官方宗教。清真寺成为部落中的一个重要政治机构，伊斯兰教既是马来苏丹们实行统治的政治工具，也是人们联系的纽带和精神支柱。历史学家和东南亚伊斯兰教学者都认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伊斯兰教的发展与郑和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郑和及其许多随从都是虔诚的穆斯林。令许多文化研究学者感到困惑的是，作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中国人最早进入这一地区，但是主流的中华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却不及后来的印度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有学者认为，这与中国人历来不重视输出文化有关。

在 14~18 世纪间，马来半岛上曾存在过几个各自独立的王国，其中最大的是地处马六甲的满刺加王国。满刺加王国成立不久就与中国明朝建立了联系，并接受了来自中国的朝廷礼仪、生活习俗和政治思想等文化的影响。据明朝史料记载，满刺加国王祖孙三代曾先后 5 次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由于马六甲本身是天然良港，又是东西方贸易的交汇点，因而逐渐成为当时东南亚主要的国际贸易中心。加上锡矿的发现和新作物的引进，满刺加发展成为一个盛极一时的王朝，是马来西亚历史文化的象征。一些学者认为，满刺加王朝前后虽然只存在了一百多年，但它对于马

来西亚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直至现在，人们还可以发现它在现代马来西亚政治和文化领域内所留下的巨大痕迹。^①现任副首相阿都拉巴达威曾以马六甲王朝与今日马来西亚相提并论，认为马来人目前的辉煌成就，已经超越了一度绽放耀眼光辉的马六甲王朝。^②他是在一个“建立辉煌的马来民族”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这不能不让人感受到满刺加王朝在马来民族心理中的重要位置。

盛极一时的满刺加王朝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轰然倾倒了。1511年西方殖民者葡萄牙人的入侵，开始带来了掠夺、奴役和苦难。此后，马来西亚相继遭到荷兰、英国以及日本的侵占，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长达数百年之久。殖民者的入侵冲击了传统的马来亚社会，也加速了它的近代化进程。尤其是英国人于18世纪中叶夺取统治权以后，这块土地开始步入了现代世界，进入新的里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锡等矿产品以及后来的天然橡胶成为西方重要的工业物资，马来半岛对于英国人来说也就具有了超出仅仅作为亚欧货运中心和战略据点的重要意义，于是对半岛的殖民开发便开始了。马来原住民人口稀少，无法满足开采锡矿、发展大种植园和橡胶种植业的人力需求，殖民政府于是从中国、印度、锡兰等地大规模引进移民。在恶劣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下，广大移民以自己的血汗和生命，换来了殖民经济的急速发展，与此同时也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据史料，到1947年在马来半岛580万人口中，马来人占43.3%，华人占44.9%，印度人占10.4%。移民占了人口的一半以上。他们带来了各自的本土文化、

陈晓律等：《马来西亚》第15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10.21。

信仰和社会组织形式，使马来半岛形成了以马来人、华人为主体的多种族社会。英国人对不同种族采取“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对种族间的交流和融合设置障碍，以利用族群矛盾控制社会，维持半岛的政治局面。这就使马来半岛社会始终处于分裂和低度整合的状态。

但是，随着历史的推进，现代的观念和体制开始被半岛社会所接受。一方面，半岛上的民族资本尤其是华人资本的力量在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马来半岛上知识阶层队伍在不断壮大。他们了解西方文化，接受了自由、民主、平等的西方观念，对殖民主义统治深恶痛绝，开始憧憬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这样，马来民族主义产生了。二战期间，英国在日本面前不堪一击，本地人尤其是华人领导的游击队独力担当了抗击侵略者的主要任务，这进一步增强了半岛人民的自信。白人至上的神话被粉碎了。因此，虽然二战结束后英国人回到了马来半岛，但是在世界性的反殖民主义和争取独立的历史潮流的推动下，独立进程不可避免地展开了。当然这一进程充满斗争和曲折直到1957年8月，马来亚联合邦才终于从英联邦内独立。1963年9月，马来亚联合邦与另外几个英属殖民地新加坡、沙巴、沙捞越合并组成一个更大的政治实体马来西亚。1965年8月，在一番政治争执之后，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至此，马来西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今天的马来西亚社会是一个多元种族文化社会。据马来西亚国家统计局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全国人口2327万，在人口的种族构成中，马来人和其他土著居民占65.1%，华人占26%，印度人约占7.7%，此外还有少数其他族裔。伊斯兰教是马来西亚国教，因此绝大部分马来人都是穆斯林，约占60.1%。其他宗教中，部分华人信奉佛教（19.2%），道教和儒家学说（2.6%），印度人则信奉印

度教(6.3%)，还有不少人信仰基督教(9.1%)无信仰或其他占9%。与民族构成相应，马来语、汉语和泰米尔语是三种主要语言，此外还有殖民地时期留下的英语也是重要语种。

3. 多元文化中的政治与经济：在民主与威权之间

对于长期处于低度整合状态的马来西亚来说，要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独立只是迈出了第一步。“独立在本质上意味着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完整的现代意义上的‘马来民族’才开始出现，但新政府能否真正把这个社会中原有的各个种族真正融合成为一个全新的民族，还要经过若干考验。”^①马来西亚必须对殖民地的政治、经济遗产加以清理，在此基础上进行某种形式的社会重组和整合。毫无疑问，在国内处理好种族关系是摆在他们面前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英国人的统治造成了马来西亚按种族进行分工的社会形态。英国人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采取了对各种族——主要是马、华、印三大种族采取“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马来人作为土著居民在法律上被授予“特权”例如优先录用马来人作为政府机构的文职人员，只允许马来人拥有和使用土地等等。马来西亚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被保留下来，马来统治者苏丹仍然拥有和控制着自己的土地以及以此为生的农民和奴隶。英国人的“保护”政策的潜在意图，就是将马来人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华人和印度人则被认为是“候鸟”是临时工人而非永久居民他们在政治上实际上被判为二等公民。但是与土著居民被“保护”的情形不同，移民们只须服从殖民政府的法律，可以建立使用自己民族语言的学校、办报纸、组织协会，并管理本邦族的内部事务。土著人被迫继续作为稻农，而移民们则投身于现代经济部门，成为城市居民。

陈晓律等：《马来西亚》第139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

这样“，保护的效果与给予移民社会的自治结合起来 造就了一个多语言、多文化、多宗教的社会”^①。土著人比较高的政治地位与移民的比较优越的经济状况，表面上构成了某种均势，实际上包藏着彼此之间的严重的不满和对立。后来的独立进程，以及独立以后的政治和社会发展都证明，种族关系问题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问题。今天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包括教育发展政策，种族和谐仍然是一个必须优先考虑的核心要素。

经过代表各种族和阶层利益的政治团体的一番较量，马来西亚在 1957 年颁布了第一个宪法，并据此建立了自己的宪政体制。1957 年宪法可以说是国家的基石，除了中间作过部分修改外，其基本内容一直沿用至今。根据宪法，马来西亚的最高元首是国家各民族团结的象征，他由统治者会议^②从 9 个世袭苏丹中选举产生，身兼国家元首、伊斯兰领袖和武装部队最高司令于一身，拥有立法、行政与司法的最高权力。然而与英国女王一样，这些巨大的权力基本上是象征性的，实际权力则掌握在当选的内阁总理之手。国会由上下两院组成，其主要职能是修改宪法、制定法律法令、讨论财政预算等。上院议员主要由最高元首直接任命，加上每个州各指派 2 名议员产生。下院议席则全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内阁总理由下院的多数党领袖担任，5 年一任，为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这样一种议会制度显然是英国议会制度的翻版，是殖民地政治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马来西亚政治体制中的民主是有限度的。在 1969 年发

黛安·K·莫齐主编：《东盟国家政治》第 177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

统治者会议是最高权力机关，由马来西亚 9 个州的世袭苏丹和马六甲、槟榔屿、沙巴和沙捞越四个州的州长组成，但只有苏丹拥有选举和被选举权。

生的种族冲突事件以后，政府的权威统治凸显出来。简单说来，1969年事件是华人对政治地位的要求与马来人对经济状况的不满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当年的大选中，华人反对党（民主行动党）放手一搏，对执政的联盟党造成巨大的冲击，使之仅赢得不足一半的选票。5月12日，当吉隆坡华人青年抑制不住兴奋举行炫耀性的庆祝游行的时候，马来人的担心和失落感爆发了。次日，一场涉及数百人死伤的流血冲突发生了。这一事件成为马来西亚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统治阶层认识到，种族之间的深刻裂痕将危及马来西亚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基础，要铸造一个统一、持久的马来西亚，必须制定一种属于全国人民的意识形态，同时通过经济改革，缩小种族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最终消除种族骚乱的社会根源。“国家理想（RUKUNEGARA）和“新经济政策”就是这个时候提出来的。“国家理想（又译“国家原则”）的主要内容是：

我们的国家马来西亚，是一个为使它所有的民众凝成一种更伟大的整体而奋斗的国家；它将保持一种民主的生活方式；创造一个公正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全民族的财富将能够平等地分享；这个国家能够保证它的人民能够过上自由富裕的生活，也能够保持其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它也将努力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一个进步的社会以便其能够朝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发展。^①

“国家理想”还要求国民信奉神、忠于国王和国家、维护宪法、服从法律以及具有良好的行为和道德。在制定这种统一的意识形态的同时，国会还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1971年）把某些敏感

陈晓律等：《马来西亚》第158页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